

侯丽 王宜兵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鲍立克在上海

——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



鲍立克肖像（1952 年）

目录

序	008
导言 “现代前夜”的大上海都市	011
一、鲍立克、现代派与大上海都市计划 /	018
二、本书框架 /	026
第一章 左派建筑师：	
鲍立克在德国的专业教育与实践（1903—1933）.....	027
一、20 世纪初的德国与现代运动 /	029
（一）包豪斯和现代主义运动	
（二）现代城市规划在德国的发展	
二、现代艺术和设计教育 /	039
（一）德累斯顿工大的学院派建筑学基础（1923—1925）	
（二）短暂却丰富的包豪斯经历（1925—1926）	
（三）柏林工大的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教育（1926—1927）	
三、短暂的战前德国的建筑师生涯（1927—1933） /	043
（一）格罗皮乌斯的合作者（1927—1930）	
（二）独立建筑师（1930—1933）	
四、逃离柏林 /	049
第二章 室内设计师、自由撰稿人与大学教师：	
战乱中的流亡与设计（1933—1945）	051
一、海上流亡之路 /	053

二、一个德国人在孤岛上海 / 055

(一) 时代公司与犹太大亨 (1933—1935)

(二) 战火下的“新时代” (1936—1944)

(三) 无国籍者的舞台

(四) 发出“中国呼声”

三、日据时期的圣约翰大学与建筑工程系 (1941—1945) / 081

(一) 光与真理

(二) “一个时代的特征集大成于其建筑”

第三章 都市计划教授：

鲍立克在约大的教学与设计实践 (1945—1949) 091

一、约大的都市计划教学 / 098

(一) 鲍立克的都市计划讲义

(二) 鲍立克指导下的约大都市计划设计课

二、鲍立克事务所战后的室内和建筑设计 / 119

(一) 孙科公馆、姚宅和“锡而刻海”等

(二) 英士大学校园计划

(三) 火车站场设计

(四) 贾汪煤矿市镇计划

第四章 市政计划家：

鲍立克与大上海都市计划 (1945—1949) 139

一、1945 年之前的“大上海计划” / 143

二、“都市计划在中国之必要”——初稿 (1945.10—1946.8) / 147

(一) 设计组的建筑师们

(二) 总图初稿

(三) 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三、技术中坚——二稿以及二稿后的激烈讨论 (1946.8—1948.8) /	175
(一) 总图二稿	
(二) 二稿编制间的争论	
(三) 闸北西区重建计划	

四、临危受命——战火声中的三稿 (1948.8—1949.10) /	193
(一) “从速编制三稿”	
(二) 三稿的主要内容	

五、从初稿到三稿 /	200
(一) 现代城市空间组织	
——“邻里单位”“卫星市镇”和“疏散”理念的嫁接	
(二) 现代道路交通体系——综合交通系统的引入	
(三) 计划实施的路径——区划等方法和制度的探索	

第五章 国家建筑师：

回归东德的鲍立克 (1949—1979)	205
一、返乡 /	205
二、鲍立克在德国的第二个三十年 /	221

后记：鲍立克在上海的遗产	227
--------------------	-----

附录 鲍立克年表 (至 1949 年)	236
参考文献	238
图表来源	241
致谢	246

序

纸，丝质的，红色。

每年秋天，我亲爱的祖父都会跟我一起做各种奇思妙想的风筝。这几乎成为一种仪式。

他会给这张神奇的红纸绑上精巧的木结构，尾巴上缀上不同颜色的色带，随风抖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秋风乍起，他就会带我到附近的公园，我站在他身旁，看他放飞我们一起做的风筝……

祖父的公寓。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这里是各种梦想和想象的发源地。

一个充满神秘感、深藏着各种秘密的地方。

我的祖父——我听说——和我的祖母，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一个地方。

那时我九岁。我记得这个地方好像叫“Tientien”，一个极其遥远、我都不会发音的地方。

为了让我的生活简单点，我只学会说：“中国”。

让我好奇的是，事实上，我的祖父母看上去根本一点儿也不像中国人。

我决定好好搜搜这个地方……

这个公寓到处是物证。后来不见了的漂亮的黑色衣柜，上面有高雅的中国风格手绘。

玻璃橱里装着精巧的小玩意儿，覆以美丽的花纹。东方艺术装饰着墙壁。

书房里很多书上有我读不出来但无比崇拜的中国字。兰花和樱花常年盛开。

每次我斗胆偷偷打开这些橱柜，都会发现无数的宝藏。

在我的记忆里，精致的丝绸，富丽堂皇的色彩织成的华丽的和服点缀着金边，都是些神秘的物件。

对我和我的祖父母来说，此地是我们的乐园。他们喜欢叫这儿“云上九号”。

我的祖父住在他自己设计的公寓顶层，在那里我们能俯瞰世界，仿佛能不时脱离下面街道上发生的灰暗的日常生活。

这个公寓总是向艺术家、建筑师和朋友们开放。

我的祖母总会出人意料地、像魔术师一样准备许多精致的餐点。

节日和展示总是精心筹划，孩子们感受着爱与关注。

然而——时间走得像风一样快。

我的祖父理查德·鲍立克从中国上海回到东柏林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不仅仅建造了许多现代住宅，还预见了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生活方式，这是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没想到的。

他为自己的家庭设计的公寓，不仅仅有笔直的墙壁，还有宽敞的空间和宽容的氛围。

祖父去世以后，我现在幸运地住在这里。

直至今日，仍然有那么多文件和物品等待被发现。

书籍、信件、照片、建筑草图，写着他们名字首字母的、
曾经飘洋过海的行李箱。

研究我祖父留下的遗产将是我前行的动力。

在秋天，每当我打开通向屋顶花园的门，同样的微风吹
拂过来，我会想起祖父的风筝。

孙女 娜塔莎·鲍立克

写于 2016 年 10 月

（侯丽译）

导言

“现代前夜”的大上海都市

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建设发展，展现和浓缩了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曲折历程。自清廷依据南京条约在原洋泾浜北岸划定东自外滩、西至今河南路的英租界领地以来，城市——尤其是对外通商口岸——开始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交通通讯、工业技术、资本与资讯越来越集中于这些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中。进入 20 世纪上半叶，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城与乡之间的差别与差距愈发显著。促使帝制崩溃的辛亥革命，看似烽烟四起，从城乡分野的历史空间分布上看，则完全体现了这种新兴的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发端的革命，在更前沿的接触现代化及西方影响的各对外通商口岸和省会城市中最先爆发，揭示了城乡之间、开放与未开放的地区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认识的巨大差异。在这之后，现代政体的难产，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抛开意识形态的争斗，也可从这片广袤大陆历史空间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中找到解释。

上海的特殊性在于，其由外部力量强加于近代中国最为繁荣的农业文明腹地之上，以城市为触媒，引领了地区的现代化转型。在现代前夜的中国大陆，船舶是最重要、可靠和低成本的运输工具。上海位于拥有几乎半个中国最勤勉聪慧的人口的长江三角洲，扼守物产丰富的长江流域出海口，水上航路以它为起点或终点，“面对太平洋，扼长江入海之咽喉，居中国东海岸线之中心，有黄浦江纵贯其中，苏州河接连运河，与江南腹地一气呼应”^①。富饶的长

^① 见《大上海都市计划草案初稿报告书》第三章“地理”。

三角，能够为迅速增长的数百万都市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补给。横贯大都市地区的黄浦江江面开阔，因为陆地阻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年中绝少受到台风侵害，风平浪静，沿线都可作为天然停泊及转运良港。黄浦江在最低潮时有8米左右水深，数百米阔度，能够满足普通货运船只往来通行。它主要的缺陷是深水道有限，并且因为水质浑浊、流速缓慢，泥沙容易淤积。此外，黄浦江与长江交界处有宽度超过3公里的长段浅滩，需要经常疏浚，方能允许深水船只进入；大多吃水比较深的远洋船只，只能在黄浦江口停泊，由浅水船只接驳。相对于北方同样是沙洲遍布的渤海湾冲击平原地区，水深却缺乏与内陆便利连接、且有冬季冰冻之虞的东北沿海，以及台风频仍的华南沿海，上海港口状况虽然不是最为理想，在中国海岸线上却有着不遑多让的比较优势。

自1865年起，上海的对外航运业务逐步扩大，至1933年约70年间，自吴淞口至张家塘港（靠近今徐汇与闵行交界处）的39公里沿线已经布满客货运码头，在市中心段外滩的金融商业区尤其集中，异常繁忙^②。根据上海市国民政府浚浦局的统计报告，1935年进出上海港口船只达16000多艘，内河航行船只超过10万艘，平均每日有340艘船只进出，其中65%都是海运及沿海船。上海港整体船舶吨位在这70年间从200万吨增加到3900万吨，差不多扩大了20倍，以海洋贸易运输为主，超过了同时期许多欧洲大港的装卸量^③。

通过被迫打开的海上航路，上海建立了通达世界各地的对外贸易。在清廷及英、美、法等多国力量影响之下，铁路、港口、电报电话等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强化了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交通和贸易枢纽的地位，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最为“摩登”（modern）的大都市，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之都”。1876年，淞沪铁路局部通车；数年之后，沪宁、沪嘉铁路通车；

②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上海港口计划初步研究报告》，1947年。

③《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二稿报告书》第四章“港埠”，1948年。



图 0-1 1948 年上海繁忙而拥挤的以人力装卸的外滩码头

1916 年沪宁、沪杭两路接轨，同年上海北站落成，成为连接富饶的江苏、浙江两地的铁路枢纽站。铁路带来了长江三角洲客货运输的现代化转变，而电报电话技术的引入则是现代讯息传播的另一场革命，推动上海与世界更便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因为清廷最初对铺设国内电讯线路迟疑不决，上海是先与国外、再与国内建立这种联系的。丹麦人 1871 年在上海设立了大北电报公司，借助已然铺设的国际电缆，先行开通上海与日本及西伯利亚业务，至 1880 年始开通京沪电报，1881 年开装电话业务，1882 年上海与南北各线、海外联系全线联通，大北公司当年被收归国营，改为官督商办^④。

战前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和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银行总行位于上海的占全国银行数量的 40%。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上海进口货物总值占到

^④ 《大上海都市计划草案初稿报告书》，第二章“历史”。

全国的 60%，出口约占 50%，成为海外向中国大陆倾销货物和中国商品出口的最重要口岸。

借助金融资本，包括外资和华商，上海进一步吸引了制造业聚集。尽管并非最靠近工业原材料产地，但仰仗便利低廉而发达的水路运输，上海制造业突飞猛进，迅速成为中国的都市工业制造中心：战前上海的工厂数约占全国的 31%，资本占全国的 40%，工人数占全国的 32%，尤以轻工业特别发达。其中，各行业工人数量占全国同业工人数量的比例，机纺业为 42%，棉织业为 31%，缫丝业为 30%，面粉业占 40%，机器业占 47%^⑤。

开埠近百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上海始终呈现出三界四方、华洋杂处之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上海从未在同一个市政管理机构统领之下发展建设，南市、公共租界、法租界、闸北及江湾，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与都市文化的势力圈。换句话说，在 1945 年以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海市，而是多个城镇的拼合体。1854 年，英、美、法租界联合组织的工务局成立；1862 年法国人退出工务局，自行组织管理机构；翌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工务局改称“工部局”，统筹税务、警务、市政管理。公共租界于 1863 年（同治三年）率先装设自来水，法租界于 3 年内跟上；公共租界 1864 年铺设了煤气管网，法租界完成于 1866 年；而电力方面，1882 年英、法各自成立电力公司。上海的华界建设虽然落后于租界，但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已经是遥遥领先：1902 年建成自来水厂，1907 年成立华商电气公司，1910 年成立闸北水电公司，1919 年成立浦东电气公司^⑥。

20 世纪上半叶，时局的动荡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大上海都市人口和资本的聚集。由于租界治安良好、就业机会众多，每次国内外发生战争、乡村内陆经济萧条，都会引起上海人口的激增。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

⑤ 根据财务组提供的上海经济情况报告，见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46 年 8 月 24 日）附件。

⑥ 同上。

是难民们的偏安之所。这片占地 7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了 300 多万人，既是中国最为西化和现代化的都市，也是贫富两极分化最为极端的地区。租界内外，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古老的白银帝国因短暂的和平聚集起来的财富，依赖“帝国主义”贸易倾销逐步成长的买办阶层，与底层民众的赤贫，都鲜活地并存于在这远东第一大都市之中。在 300 多万人中，居住在不同治权下的居民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城市与设施。例如，能够享受自来水供应的上海居民仅有 6 万户，煤气用户 2 万户不到；在上海的几个华洋电厂，系统各有标准、互不统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租界到了夜晚仍灯火通明、车马喧嚣（“夜上海”），而南市和闸北如中国大陆广大乡村地区一样，随着日落即陷入黑暗之中。在高达每平方公里 20 万人的人口密度之上，普通市民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状况极为恶劣。根据 1946 年 8 月上海市民政处的统计，全市出生人口 3760 人，死亡人数 3310 人，是前者的 90%；而闸北棚户集中地区，出生 14 人，死亡 47 人，比例为 1:3^⑦。

近代上海大都市那些耀眼的贸易和经济数字，大多是通过非常传统的作业方式、低廉到难以想象的劳动力，以及在今天看来极不人道的超常劳动时间与超高劳动强度来实现的。例如，远高于鹿特丹港装卸数量的上海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港口，而是沿着黄浦江两岸蔓延展开。除了吴淞、龙华两处，因为沿浦岸线空间的拥挤狭窄，连普通的驳船和卡车都无法采用，更不用说现代装卸设备。每年几千万吨的货物主要是依靠廉价的人拉肩扛而实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奇迹。

1933 年，当德国建筑师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因受纳粹威胁而流亡至上海之际，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矛盾而具有冲击力的都市景象。如他后来给自己的前雇主、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和教育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信里所说：“上海的社会结构是由一大群有钱人和赤贫的、

⑦ 《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初稿报告书》，第九章“公共卫生”。

住在棚户中的无产阶级所组成，缺少中间阶层——多亏了前者，身无分文的我（作为建筑师和家具制造商）能在这儿混口饭吃……”^⑧

而邀请鲍立克来上海的好友鲁道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的夫人乌苏拉（Ursula），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3年前抵达上海虹口港时，更是对这里贫穷和落后的程度感到震惊：“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像（这里）欧洲人的傲慢一样可怕。”船只靠岸后，她看到纤夫们一个紧挨一个从底层船舱里走出来，吃力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的踏板上，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要碰撞在一起：

（他们）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一边……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哭诉着的残疾人，有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癞痢头上没有头发。^⑨

在乌苏拉拜访的无锡棉纺厂和丝织厂里，劳动力以女工和儿童为主，大多数女工的年龄在16岁至22岁之间，而多数儿童看上去不过10岁。他们每天在炎热的工厂和震耳欲聋的噪声下工作12个小时，“婴儿们躺在机器旁边，母亲们则用赤裸的双手从几乎沸腾的水中捞取蚕茧……”

在浦东的棚户区，“有些棚子是用废旧铁皮搭起来的，既无窗子又无砖石；没有地板，一个做饭用的小炉子就放在棚前的露天场地里。人们的模样简直无法描述。成年人几乎光着身子披着几块破布片走来走去。这里有上千栋这样的小棚子”。^⑩

⑧ 见 Richard Paulick 给 Walter Gropius 的信，1941 年 7 月 6 日，哈佛 Houghton 档案馆。

⑨ Ruth Werner, “Sonja’s Report”, 23-24 页。

⑩ 同上，第 6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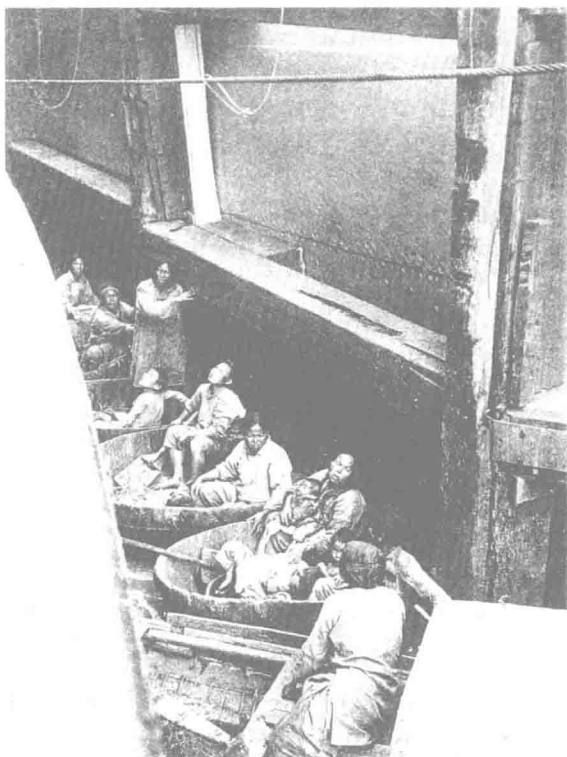


图 0-2 汉堡嘉及夫人 1930 年到达上海虹口港时所摄船边乞丐的情景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生活的欧洲人享受着外国人的特权，刻意地保持着比欧洲更欧洲的生活方式，一切家务活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代劳。在乌苏拉看来，那些太太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顾”，只热衷于谈论赛马和电影。到上海后写给家人的第一封信中，乌苏拉调侃道：“只要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桥牌和斥骂下人，我们就成了百分百的上海人。”^⑪

^⑪ 同上。